

龚自珍与海门

□李元冲



发现海门

龚自珍(1792年~1841年),字璚人,号定庵,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朝思想家、诗人、文学家,曾任内阁中书(七品官,相当于今县、处级)等官职,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他的诗文揭露了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龚自珍主要活动于嘉庆、道光时期,但当时欣赏他诗文的人不多,在他死后多年的晚清时期,随着清末政权的越来越腐败,人们才发现龚自珍诗文的思想性和政治性。故梁启超认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柳亚子赞誉龚自珍的诗文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龚自珍不管在当官时还是辞官以后均未来过海门,也没有为海门办过任何事情,当然更谈不上来海门调查研究。但奇怪的是在龚自珍的一篇文章中却写到:发现了海门南部历史的创造者和开发者。这是怎么回事?原来龚自珍曾为当时一个已逝世近百年的海门人陈朝玉写过一个《海门陈君祠堂碑文》,碑文中称陈朝玉是海门的“先啬”(神农氏,农业的创始人和发展者),从而陈朝玉就被尊为海门的“田祖”(“先啬”的通俗称谓),并记入了多部志书中。

众所周知,海门是江海冲击而成的沙洲,成陆至今已有2000多年,2000年中屡涨屡坍,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涨坍轮回,谁也没有去考证(也无法去考证)是谁发现和开发了某沙某洲。可是乾隆年间的一次复涨

却在龚自珍的笔下找到了“海门先啬”。这对2000多年前就开荒种地的海门祖先如何交代?

那么《海门陈君祠堂碑文》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龚自珍也在碑文里写了:“矣、兆熊以状谒(呈递进见文书并说明情况)内阁中书龚自珍,……以为乐石(碑石)之文”。意思是说陈矣(陈朝玉第四代孙,经学研究者)、陈兆熊(陈朝玉第五代孙,时为翰林院编修)把拟好的碑文内容交给龚自珍,请龚自珍为祖先陈朝玉写一个碑文,于是碑文就这样出炉了。

从碑文的内容看,有许多疑问。例如,陈朝玉究竟是谁里人?碑文中竟称陈朝玉是“江南某县人”,难道陈矣和陈兆熊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崇明人?在碑文全文的800多个字中,也没有一处提到“崇明”二字,把当时正在逐渐形成的这块海门土地称为“通州、常熟间东地”(实际位置是在通州以南、崇明以北),对海门的地理位置竟然如此不了解;再如,众所周知海门设厅时就有40多个沙洲,每个沙洲从几平方里到几十平方里,但碑文中描写陈朝玉看到的是“豁然划然亘(指延续不断)二百里,君履其侧,四无居人”。陈朝玉最早来的三角沙东西长不过10多里,哪来的200里?明明是一块块沙洲,哪来的延续不断?(据《光绪海门厅图志》记载:时海门“辖四十三沙”,疆域为“东西距一百四十里,南北距三十六里”)显然碑文的起草者对当时海门的地情地貌一点都不了解!

但其实也不奇怪。因为陈朝玉早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就搬到了长洲(今苏州)居住,后面的子孙在乾隆以后也多数居住或迁居外地,陈矣就是从小生在长洲,居住在长洲。陈兆熊小时曾居住过海门,但升官后也迁居京城。

据了解《海门市志》里的陈朝玉碑文内容是从龚自珍的《定庵文集》中来的,至于是不是刻成了石碑还是一个问号。因为《海门陈君祠堂碑文》约写于道光五年(1825年),当年正好陈兆熊去福建任乡试副考官,回来后即暴病身亡,因此陈兆熊即使看到了碑文内容,也根本来不及去为陈朝玉建祠刻碑。

那么,陈朝玉的祠堂是不是在陈朝玉死后就建了呢?我们从清代的多部志书中,未找到“陈君祠堂”,反而找到了海门曾为陈朝玉的女儿陈八节姑建过“节孝坊”(建于乾隆五十五年),此坊至今还保存在海门镇西郊。在“节孝坊”的碑文中也没有提及“陈君祠堂”之事。所以“陈君祠堂”也许原本就没有!那么是不是在龚自珍碑文写成后建了“陈君祠堂”?这也几乎不可能。因为一是龚自珍在世时的名气并不大,官位也不高(七品),当时海门厅的同知(五品)级别比龚自珍还高,根本不会拍龚自珍的马屁;二是道光以后在海门没有显赫的陈氏族人,有头有脸的人都搬到长洲或到外地当官去了,因此陈君祠堂也没有合适的地方和资金去建。

清代的志书也很谨慎,如清《嘉庆海门厅志》《道光海门厅志》等对陈朝玉也只字未提。在清《光绪海门厅图志》里,仅把陈朝玉放在《寓贤列传》(寓贤:寓居在海门的贤士,也就是说没有把陈朝玉当海门人)作了简单介绍,《海门陈君祠堂碑文》的内容也没有在该志中收录,更没有讲到为陈朝玉立祠之事。但1996年以后出版的《海门县(市)志》对陈朝玉的介绍不仅详细多了,而且还写上了“后人与乡民为陈朝玉立祠”,并把龚自珍的《海门陈君祠堂碑文》的全文收入了该志的《碑文》中。为此,有关部门为挖掘海门历史文化、宣传这位“田祖”时,曾经组织人员去找寻、挖掘陈朝玉的祠堂和墓葬,但都一无所获。

对陈朝玉是不是海门的“田祖”早已有人提出了疑问,通过本文对《海门陈君祠堂碑文》的解析,我们相信历史的真相将会越来越接近。

海门地名雅趣

□黄滨逊

地名是历史的密码,是时光的印记。海门这片由长江泥沙堆积而成的土地,它的地名中既蕴藏着无数沧海桑田的故事,又蕴含着许多先民的智慧和诗意。

“海门”,先不说她的山清水秀,物华天宝,光说“海门”这个地名就已经是一个绝妙的隐喻了。明代以前,这里还只是长江口外的一片沙洲,渔民称之为“东布洲”。明万历年间,江水改道,沙洲与陆地相连,始有“海门”之称。这个“门”字用得极妙,既是地理上的门户,又是心理上的屏障。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曾写道:“海门者,江海之门户也。”一语道破了这个地名的双重意蕴。

“余东”之名,是古人命名之雅趣。此地本是长江最东端的沙洲,却以“余”字自谦。明嘉靖年间,为防倭寇在此筑城,取名“余东”,暗含“余地东来”之意。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记载:“余东城,明嘉靖中筑,以御倭。”如今城墙早已湮没,唯有这个名字还在诉说着当年的烽火岁月。

“三厂”之名,看似粗陋,实则大有来历。

清乾隆年间,因这里设有三个盐场,故称“三厂”。盐民们在此煮海为盐,留下了“烟火三百里,灶煎满天星”的壮观景象。清末状元张謇在此创办大生纱厂,将“厂”字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一个简单的“厂”字,串联起了从传统盐业到近代工业的沧桑巨变。

“常乐”之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足常乐”的生活哲学。据《海门县志》记载,此地原名“长乐”,后因避讳改为“常乐”。清代学者焦循在《易余籀录》中写道:“乐不在外,而在心之常。”这个名字正是这种处世哲学的生动体现。如今镇上老人仍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守护着一份难得的从容。

“麒麟”之名,则寄托着农耕时代的美好祈愿。据传明代有麒麟现于此地,视为祥瑞,故而得名。清代诗人袁枚曾赋诗:“麒麟本是太平兽,现身应在圣明时。”这个名字承载着先民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朴素愿望。如今镇上的麒麟灯会,依然延续着这一文化记忆。

“天补”之名,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突遇

暴雨,龙袍淋湿,在此补晒,故称“天补”。可地方志记载分明是“田婆镇”,因明代有田姓婆婆在此施粥而得名。老百姓才不管这些,照样指着镇口的晒场说:“瞧见没?这就是当年晒龙袍的地方!”历史的真假早就被海风吹散,留下的却是活色生香的故事。

这些地名就像一本厚重的史书,记录着海门从沧海到桑田的变迁。它们不仅仅是地理知识,更是文化符号,承载着先民的智慧结晶和精神追求。在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今天,这些充满诗意的地名,依然在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这片土地的历史与文化根脉。

海门的每一个地名都韵味十足,风雅有趣,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颗颗晶莹剔透,折射出海门文化发展变化的轨迹,散发着海门百姓草根文化的阵阵清香。当我们轻轻念叨这些名字的时候,仿佛听见江海的海声,看到先民的身形,真切感受到这片泥心夹沙土地的跳动脉搏。这或许就是地名最大的魅力所在——它们让历史变得可触可感,让文化得以代代相传。



施敏摄

海门名人传(连载)

(上接6月7日A4版)

奠基治厅第一人

——口碑堤碑德政碑主徐文灿

□周世康

当合口处只剩几十丈宽的缺口时,江流越来越急,江水也越来越深,在大堤南侧竖门板、横船只等既往的阻缓水流的措施越来越难实施。在前伸的大堤顶端,抛下担来的土,犹如大风扬灰,倾倒之刻水花也不起一个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用麻袋装满沙土(俗称土牛),几个一起抛下,也随即被汹涌的江流冲走。数次数十次地组织突击,但都以失败告终。面对相向延伸而来的大堤,听任缺口处江流傲慢地奔流,就是再也难以靠拢一尺,乡绅民人纷纷叹气,束手无策。而徐文灿斗志不减,并鼓舞大家坚定信心,事在必成。年关越来越近,工程暂时收工,冬天,就这样过去了。

工程停下来了,徐文灿的脚步没有停,他还常去工地。有时带几个随从,有时请几位有这方面经验的行家,有时是单身一人。他要观察分析原因,要集思广益找到办法。他的决心没有动摇,但他心里十分明白,一时的不动摇能够做到,但找不到对策、出路,那决心只是空中楼阁,没有基础没有意义,更不能维持住群体的决心。他到底在哪里受到了启发,或者是谁给他出了良策,未见记载,但这段歇工的日子他肯定没有空度。第二年春天开工以后的进展,《徐公堤碑》刻写得清清楚楚:“明年春,昏夜见红灯千百,涉水纷来,及新堤而还也。众讶为神,额手祷祝,次日就其涉处弯环筑土,土坚力省,一日而堤成。堤长二千一百八十丈,广一丈四五尺至三四丈,按水势之缓急而宽狭因之。”这段文字所述颇有神秘色彩,实际上堤成的原因讲得明明白白——“弯环筑土”,大堤不再是直线前行了,而是顺应水势缓急堤身相应弯曲,水流急处堤身形成内曲的弧度,延缓分解水流正面的冲击力;并且,堤岸宽度也不再一个尺度,在那些承受急流的堤段,最宽的达四丈,大大提高了堤身的抗冲击能力,而水流一般的堤段,堤身只有一丈四五尺宽。这两条起关键作用的措施,是徐文灿在停工时段调查研究得来的,还是另有出处,人们至今无法弄清了,但它的出现,却是一个神示的场面:“昏夜,见红灯千百……”这人间不见的场面,令人惊讶给后人启示使人鼓舞:今有天意神助,大堤必成!于是,第二天群情振奋,众志成城,一日就全部完工,高奏凯歌!

二千一百八十丈的大堤筑成了!从此,江中之厅境与平原之大陆“无缝对接”,从生活必需品到生产资料,从负笈求学到人文交流通道顺畅。而且,原来被江流隔断的州厅之间的民人,既不再因风大浪恶时无法来往,也不再有了被陡起的怪潮急流淹毙的祸患了。徐公堤把初建的海门厅从被四周江面封隔的闭环环境中解放出来,居功甚伟。出乎意料的是,徐公堤还成就了另外一件大好事,使海门厅堤内的诸多沙洲几年中相互连接而成开展的大沙洲,堤外,则是涌现出了更多的新沙。

古海门裁县为乡的康熙十一年(1672)及其前后的二三十年中,长江水直抵张謇后来所建的老通吕公路,有史料说,老通吕公路的部分路段就是长江北岸的堤岸。《康熙两淮盐法志》的余东盐场图,五里墩等都在江边,《乾隆两淮盐法志》的余东盐场图上,出现了今位于四甲境内运盐河南岸的梁家店等,但去江边不远。这些表明,那一段,从余中四甲八索余东六甲弯弯曲曲到吕四等一些

老镇往南,就是辽阔的长江江面。自1690年往后,长江北侧陆续涨出众多沙洲,其中就有后来通州划归海门厅的十九个沙洲。当时它们纷纷出水,但是互不相连。徐公堤筑成后,流入海门厅沙洲的最窄处十里宽的大支流被堵住了,这大大改变了徐公堤北至长江北岸间这一区域环境的整个水流状况。潮涨潮落中进出的水流水速水量变了,波浪的大小范围频率变了,海潮顶托江流的位置变了,水沙运行的环境相应变了,水中沙粒直线下沉的速度,以及原有沙洲上因水速变化而引起的芦苇等各种植物生长的密度蔓延的广度等都发生了变化……其结果,堤北广大区域各沙洲间原有水道淤积加快,不断地甲连上乙,乙连上丙,原先水与沙洲组成的地理面貌,较快地被一马平川的陆地所代替。就在徐公堤筑成不到十年的乾隆四十九年(1784),因徐公堤北“悉成良田”,引发了通州与海门厅争地矛盾,省巡抚不得不派王姓官员来主持划界。不久,又引发了东西向的通州与海门厅的陆地界线不清,上级又派官员来划定各自边界,这就是后来挖成至今犹在的海界河。

堤北陆地蔚然一片,堤南的大江中,自堤成之后,竟也“涨沙累累”!长江每年携带五亿多吨泥沙奔流而下,至喇叭形的长江口,水面一下子变得宽阔,加之海浪顶托尤其是海潮每天的涨落,江水流速减缓,泥沙直线下沉,沙洲隆起。徐公堤堵住了长江的一条支流,导致了整个江面整个江流动力结构的改变,江流主泓稍向南移,堤外江中便沙洲并起。成书于1805年的《嘉庆海门厅志》中写道:“……徐公堤之筑盖举,当日便于民者行之,而其后,堤之南北,皆为沃壤。且大江之中,涨沙累累,岁增数十万亩,迄今全境俱成平陆。丽于通州,巩固无虞……”“良由徐公堤既筑,则堤之南北,及由北转东,深洪浅渚,尽成平陆。”此厅志撰写者崇明岁贡生董曰申的记述当然令人鼓舞,他说“皆为沃壤”“俱成平陆”,而且“丽于通州”,即其辽阔平展、一望无垠的丰饶壮美,超过通州。1805年,距徐公堤截断十多里宽的江流仅只三十年,这种“换了天地”样的天翻地覆式的变化,出乎人们意料,可能徐文灿自己也未曾料及。

沃野千里,吸引了大量移民,第一波海门人口快速增加的高潮,出现在这一时期。另外,一些有名的大镇也大多于这个时段起步发展,如麒麟镇。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即徐公堤筑成以后的第三年,崇明商人沈大成谋求向外发展,来到海门县东洪沙转水漾买田八窰,造房一百五十余间,奠基建镇。建镇之初占地八窰,镇区面积约零点一八平方公里。居民多数为由江南、宁波、福建等外地商人迁徙而来,及一部分弃农经商的本地人,约近二十家,百人左右。乾隆五十五年(1790),贵州遵义人王恒以举人身份来任海门厅同知,他看到徐公堤“之南北的水滩沙渚尽成平壤,增赋数千顷,增户数万家,士子吟诵,牧竖歌讴,与鸡犬之声相杂”,他由衷赞叹这“皆徐公倡议为民,与诸绅士急公襄赞之力”!他感到“公为前事之师”,自己到海门任职,非常可惜的是没有能当面拜见徐公;他觉得不能听任徐公的不朽之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于是就据实撰文,“勒石于堤上,仍构亭以复焉”。这就是《徐公堤碑》。

(未完待续)